

游击区的生活



吴润身，摄于1978年

看到这封叔侄间的书信，让我们感动的，不仅仅是这位已逾耄耋之年的老人忆往昔峥嵘岁月的热血沸腾，更是在他的记忆里那众多点滴细小的故事。现如今，虽然老人已经故去，但这些经历过战火和鲜血洗礼的、或温暖或辛酸或凛然的细节，将永远伴随着我们，让我们铭记住那段特殊的岁月。

碾孩、杏琴：

来信收到，看了您们的信，全家很高兴，知道您们全家七口人都好，小翔龙也活泼吧，我们非常欣慰！太原咱家也都好，望勿想念。

我今年已八十四岁了，您婶母也七十九岁，明年就也八十岁了。我们身体也都还基本可以，都能生活自理，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小病。您婶母还是她那个老病，常好头疼，经常得吃治头疼的药。咱家现有一个十七岁的小女孩叫魏翠英在招呼我们。她还很勤快，不错，她系您婶母姐姐家的孙女，是亲戚。

朝辉现在厂党委组织部工作，他毕业后先当工人后到组织部，因他是党员，是在当兵时在部队入党的。他是厂办的电大毕业，毕业时考了前三名。按厂规定，毕业考前三名的厂照顾安排工作，所以他是按规定入厂的。他（她）的孩子已七个月了，尚未起名字，孩子很活泼，会笑了，很讨人喜欢！万媛还在新华化工厂工作，她们也不错。现在国防厂普遍困难，大都发不了工资，兴安化工厂还可以凑乎的，还能发了工资。万媛的厂较困难，过节时才发了七月份的工资。你退休了，不

断写稿子这很好。我在庆祝抗战胜利50周年，让我写回忆录和自传，我懒于动手没写，只写了3个短篇文字登在厂报上。关于您写的敌人用木头子弹打人的事，可能是我当时讲错了，也可能是记错了，因为其意完全与当时情况不同，现把当时的情况与我的简历叙述如下：

我是在事变后半年即1937年后半年入党的，1938年参加工作，其简历是任过党支部书记，任过数任区委书记，后任过县公安局长、市公安局长、市公安局党组成员兼经保处长，大型厂矿保卫厂长，最后任党委书记，受过中共地委党校学习（相当于省委党校）和中央党校学习。其中工作最困难最危险的经历有三次，第一次在沁县五区任区委书记兼区政委时，第二次当中共代表与敌人停战谈判时，第三次是任兴安化工厂保卫厂长和任厂党委书记时。

先讲1943年任沁县五区区委书记时。五区在当时是沁县最危险的一个地区，它是接敌区也叫游击区，敌强我弱，是一个出生入死的地方，当时的干部认为是一个畏途，谁也不愿到该地区工作。当时的县委书记林纪青他动员时对我说：毛主席说过，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，这才是好同志。当时党是秘密的，我任五区区委书记时公开身份〈是〉区政委，一来区委书记是秘密的，二来当时还驻有一个部队的加强连，是营级编制，我兼这个连的政委，所以叫区委书记兼政委。这个区的环境十分恶劣，东西南北四面就有三面是敌人，东南面是沁县城敌人驻着，东面是固亦村有敌人据点，北面是漳沅镇是敌人的区指挥所，南面是二沁大道是敌人的封锁线，只有西面是伏牛山，是我们赖以存在和敌人作斗争的地方。

从五区到县委开会，还得过二沁大道敌人的封锁线，还得部队或民兵护送。我记得在1943年的秋天，我从沁南县委开会回区时，路过二沁大道敌人封锁线，护送我的部队已经返回去了，路过开村时，发现开村后面的紫山上哨树还立着。（哨树是防避敌人侵扰出发的一种信号，是用民兵看守，如没有敌情时哨树就立着；如发现敌人出发侵扰时就放倒，群众就躲避了）我以为没有敌情，就从紫山下走过，到临近紫山时发现山中间有人影走动，当时敌人穿的衣服是土色的，

如不注意很难发现，实际情况是敌人已经把看树的哨兵捆缚起来，已有了敌情，但敌人还把哨树树立着来欺骗群众。

我发现山腰有人影走动，就赶快到石岩下隐蔽，但石岩下已有好多群众在隐蔽着，因之，我把随身携带的文件和手枪埋在沙里。不多时，敌人已来抓人了，我和群众一起逃跑，敌人开枪打人是用的木头子弹。他〈们〉为什么用木头子弹打人呢？不是因为他〈们〉没有真子弹，而是因为要抓民夫，准备第二天出发扫荡。敌人的规律是每次扫荡前都要抓民夫，他们用民夫给他们抢的东西来拿用。我混在群众中一齐跑掉，没有被抓住。敌人一方面用木头子弹打人（如果用真子弹把人打死了，他还抓什么？就达不到抓民夫的目的），同时还骑马追捕群众。

我为什么能混在群众中跑掉呢？因为当时在游击区工作的同志强调群众化，穿的衣服完全和群众一样，戴的手巾是布的，穿的鞋袜也是布的，不刷牙不洗脸，要洗脸也是一个月只洗一两次，不能戴毛巾，不能穿线袜子。当时群众对付敌人的经验有三条，即叫做：“吃的好些，穿的烂些，见了太君（指日本人）走的慢些！”我们在五区（即游击区）的生活是：吞糠咽菜，风餐露宿，牺牲流血，倾家荡产。当时革命干部的待遇每天只有斤^①四两小米，到了1942年最苦难时期一天减为14两，其余靠生产自救。

冬天穿不上棉衣，夏天换不了单衣。沁县有一位县委副书记，到端午节还穿着棉衣，到群众家里还披着棉衣，农家妇女背地里批评他不礼貌。但男人还和女人吵架，男人说什么不礼貌，你知道他穿的是什么，你穿上单衣了，他还穿着棉衣，能不披么？你给他把棉絮挖了，看他还披不披？后来女人果然给挖了，还给洗了。县委副书记高兴了，也再不披了！我们在群众家里吃派饭，一家七八口人，锅里煮着野菜，用糠面擦咯咯豆，大概有斤多面，煮熟了，一家人不能自己

① 斤，此处指1斤，当时1斤为16两。

舀饭，只有家庭主妇一手舀。吃上糠菜饭，半夜就饿醒了，再也睡不着了，三人一个家都同时饿醒来了，在家找东西吃什么也没有，故三人喝白开水充饥。正在此时，邻家送来一碗糠炒面，并说饿了不能喝开水，越喝越饿。三人分的把一碗糠炒面拌的吃了，才又睡觉！

风餐露宿，是整年不能在家睡觉，热天睡旷野，冬天睡土岗子。逢年过节，刮风下雨，更加不能在家睡觉，因为敌人就是乘机来家捕捉干部的。我们有个区委副书记刚从县委调来不到三个月就牺牲了，就是因为老百姓家吃了夜饭走得迟了，就被敌〈人〉抓走了，后来跳井牺牲了！

所谓流血牺牲，就是全区主要干部大部牺牲了。区长牺牲了，区委书记牺牲了，区委副书记牺牲了，农会主席牺牲了，武委会主任牺牲了，公安助理员牺牲了等等，就是我是个幸存者。

所谓倾家荡产，就是因为我当干部，敌人把家烧光了，但左邻右舍都没烧。我和您婶母可以说是患难夫妻，因为我革命，敌人用刺刀放在您婶母的脖子上问你男人是不是八路，你婶母说不是，是个放羊的，问哪里去了，说是到我娘家拿衣服去了，才免于难。

那个时候工作很艰苦，每天昼伏夜出，每天工作要下山上山，走卅多里路。死的死了，活的人也准备天天牺牲，时时牺牲，真乃是视死如归，前仆后继，为的不当亡国奴，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，消灭战争，消灭帝国主义。我们和群众关系真乃是鱼水关系，一家人关系，对老者敬如父母，对同年的男女如同兄弟姐妹。在群众家里给担水扫院，春天一块到地播种，夏秋一块到地里收割，群众对我们无话不说，我们对群众也不时交心。在游击区工作，如果没有群众支持，一天也待不下去。我记得有一次全区在开会，半夜被敌包围，我们还没起床敌人就把炮弹、子弹打到院里，后来起床不能开灯，走时裤子和鞋都没穿上，走到路上遇上敌人就跳到数丈深的坑里。第二天吐了血，就患了便秘病，在京透视时发现一根肠子被蹲坏了。自1938年武汉失守后敌人对国民党实行诱降政策，对敌后华北实行“三光”政策，对游击区实行蚕食政策，到处捕杀干部，就是蚕食政策的体现。

第二，1946年有一段实行停战谈判。我由五区区委书记由地委任命我为中共沁县代表进城与敌人谈判。实行停战谈判是蒋介石缓兵之计，一面和谈一面向解放区进攻。1945年日本投降，毛主席到重庆设立了双十协定，停战谈判就是这种继续，谈判的三方是国民党、美国人和共产党。我们进城后处处受监视，去厕所他们也跟着，住的房子窗外就是敌人的特务。在城住了四十多天，什么问题也没解决，最后还是地下党送出情报，我们的代表用工作之便，夜间以查火车之名跑出来的，有个太行区的代表跑的晚了就被敌人关起来了。

第三，是任兴安厂的厂长和书记。兴安厂是个军工火炸药危险厂，因为出了数次恶性事故，才把我由公安局调来的。这个厂用工人的话说是玩老虎的，它出过三次大事故。第一次是在火车上烧死×人，因为该厂拿的产品到上海试验失火出事的；第二是在四月九龙坡车站，把将校军官的皮大衣全部烧掉；第三丢失了图纸。由于这三次大事故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点了名，才把我调来的。省市委要求派太原市公安局局长去，否则我们省市委连觉也不能睡了！

最后讲我们的政权是从反动派手里夺来的，而不是固有的。我在1938年任支部书记时，第一是建党，第二夺政权，因为当时的政权是阎锡山的，他们不抗日，还反对群众抗日，通过发动群众选举夺了政权，第三，组织发动群众成立青救会、妇救会、儿童团、自卫队和成立农民自卫队站岗放哨，妇救会做军鞋，而后就是“二五减租”和大囤粮、大扩兵。党员带领群众参军，我们的军队都是地方党扩大的。

总之，大体就是这些。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，我写了篇文章，大体内容是，我们党之所以是不可被战胜的，其原因有三，第一是有真理，第二是有人民群众的支持，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，第三是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。

供参考。

叔父 润身

一九九五年九月廿日于太原



背景链接

在纪念全面抗战爆发 70 周年的时候，我找出叔父生前给我写的七页长信，重温他老人家讲的亲身经历的抗日故事，希冀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战斗争史能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铭记。

叔父写信时已 84 岁，正值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时。老人家当时兴致很高，在长达七页的家书中讲了多个抗日故事，这些故事既有叔父机智躲过鬼子追捕的惊心动魄，又有他和战友们当年睡旷野、饥寒交迫却时时准备牺牲的艰辛，更有记忆中让叔父觉得温暖的鱼水军民情……



吴润身夫妇与战友夫妇合影，前排右一为吴润身，后排右一为吴润身妻子，摄于 20 世纪 50 年代

叔父的长信说明，他以三次实际行动，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教导。他从县委机关去抗日最困难的游击区任区委书记，正说明了这一点。

为了保卫人民群众，叔父与战友一次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对敌斗争，浴血奋战，出生入死。在叔父写给我的其他信中，还有很多感人至深的小细节。比如，一次叔父带着两名战士，在寒冬十月涉冰水过漳河，冻的腿脚比针刺还痛，他们咬着牙，把疼痛化为仇恨，破坏了敌人的交通线，使鬼子的火车半个月动弹不得，通信设备成为聋子、瞎子。为了分化瓦解敌人，叔父与战友经常开展政治攻势，把抗日标语写到敌人的据点和碉堡墙上。

在战争岁月中，叔父依靠干部和群众，按照上级要求，完成了囤粮、扩军、组织妇救会、做军鞋等任务，直至日寇投降。他机智英勇，视死如归，不愧为一名抗日英雄。

（吴念孩）